

# 从几则轶事谈起

——缅怀吾师吴征镒院士

王印政

(1960~)，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95~1997年随吴征镒院士做博士后。

吴征镒先生在植物分类学和区系地理学领域享誉中外，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他丰硕的科研成果和辉煌的学术成就，无需在这里重复叙述。这里要谈的，只是在吴先生指导我的研究以及一些活动中我个人接触到的几件轶事，从这些侧面可以看到吴先生的生活风趣、科学风范和渊博学识，对于从旁印证他杰出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和科学研究的崇高境界可能会有点滴的帮助。

## 一、戏剧性地成了先生的博士后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河南木本植物区系及其生态地理”，所阅读的植物区系方面论文中受益最深的便是吴征镒院士1963年的“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正是这篇论文使我对中国植物区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将我领入了植物区系的研究之门。1992年，我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从事苦苣苔科的系统学研究。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吴先生的博士后则是我梦寐以求的心愿。然而，我成为先生的博士后的过程则极具戏剧性。在临毕业的1995年初，我向昆明植物研究所投递了先生的博士后报名申请。然而，十分沮丧的是，对方回复吴征镒院士的博士后名额已满。5月份，经王文采院士推荐我联系了厦门大学生物系，对方很快就正式答应并随即寄来了工作合同。这一期间（大概是5月下旬），吴先生来到植物研究所主持《中国植物志》编研会议。开会的这天上午，我和杨亲二博士在植物标





本馆一楼正好碰见吴先生从二楼会议室出来正走下楼梯。杨亲二博士见到吴先生后便走到楼梯的正前方。当吴先生下了楼梯后，他站到先生的正前方，两腿直立，四肢并拢，毕恭毕敬地向先生行了一个标准的弟子礼。我也忙走到先生的正前方，学着亲二的样子毕恭毕敬地行礼。行礼后，我和亲二正要离开，先生突然问，“你就是王印政吧？”我连忙在先生的侧前方又行了一个点头礼，便答道，“是的，先生，我是小王，王印政”。随后，我们便同先生道别离开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和一位朋友到吴先生下榻的植物研究所招待所看望先生。我们先前商定到吴先生的住处停留时间不要超过八点钟，以免影响先生休息。到了住处，吴先生的夫人段金玉教授热情地将我们迎进屋里，请我们坐在两个单人沙发上，先生则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愉快地聊谈起来。中间，先生也简单地问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情况，但多数是我的朋友和先生海阔天空地聊。聊到诗词方面时，我的朋友向先生朗诵了他最近的诗作，并鼓励我向先生朗诵我的所谓诗作。我尽管阅读过一点诗词格律的书，但只是似懂非懂，很难写出符合严格韵律的诗词，只是用诗词的形式抒情言志而已，不宜向外人道之，更不敢在我敬仰的人面前卖弄。因此，我再三推辞。不料，我的朋友立马来了个“你不朗诵，我就替你向吴先生朗诵”。朗诵的是我一个月前填的一首词，当时抄给了我的朋友。谁知道他竟然全背了下来。吴先生听后，便说，“哎，这才有诗词的韵味”。得到先生的认可，我格外兴奋。接近八点时，我们就赶快和先生道别离开。先生送我们到门口时，便说“小王，你明天晚上再到我这里来一趟”。第二天晚上，我如约来到招待所。吴先生表示愿意重新考虑我的博士后申请，并要我一个星期后直接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人教处联系。就这样，我意想不到地成为了先生的博士后，也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后。

## 二、研究中的点滴事情

来到昆明后，吴先生并没有让我在博士后期间选择新的方向，而是赞成我推进博士期间苦苣苔科系统学的后续研究。我的苦苣苔科系统学研究除了形态地理外，还开展其他多个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包括细胞学、比较解剖学以及特殊的维管束解剖学、比较形态发生学以及比较胚胎学等。为了给我提供这些方面的研究条件，吴先生亲自请了两位先生，即解剖实验室的梁汉兴研究员和细胞学实验室的顾志健研究员给予指导。这样，我就在这两个实验室开展了上述的研究工作。梁汉兴和顾志健两位先生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优厚的研究条件和无私的帮助与支持。

博士后在站期间，我经常带着一些问题到吴先生办公室，希望得到先生更多的指导和教诲，先生对这些问题均一一耐心地解答并与我开展讨论。我记忆中尤其深刻的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请吴先生对我有关苦苣苔科植物的一篇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英文论文草稿的修改。我主要想请吴先生在系统发育解释方面把一下关。在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方面，我已经开展了几年的研究，并大量阅读了相关的国际英文文献，对这方面的叙述和术语用词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吴先生除在系统发育解释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修改建议外，还在英语术语方面进行了一些修改，并当面提出一些更精确的术语用词建议。通过查对，我感觉到吴先生所建议的英语术语用词的确更加到位并且使用更广泛。这说明吴先生时常阅读并关注国际植物解剖学的研究进展。在我的印象中，吴先生在植物系统学，尤其在植物区系地理学方面学识渊博，但没想到先生对解剖学的英语术语如此精通，决不是一般的了解。

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过程中，从来就有专注于技术的“工匠”和探索理论问题的“学者”之分。工匠可以将“器”造得巧夺天工，而学者则从大处着眼，往深处探索，直到事物的本质。工匠

务必在所擅长方面具有巧妙的经验和实践，但无须其他方面的知识。学者不仅要有一到几个方面精深的知识和实践，而且还要具备广泛的，甚至跨多个学科的知识储备。只有如此，一个学者方能融会贯通各方面的知识，做到既高屋建瓴，又具非凡的洞察力，时刻把握事物具体和普遍性的关系，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可谓化有形于无形之中，于无形之中化有形，也就是从具体事物的广泛联系中抽象出新的理论，再用新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发现和实践。重大理论上的创新往往导致人类一个时代的认识飞跃，产生全局性、长远性的影响。吴征镒院士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科学大师、大学者。先生深邃的思想和渊博的学识体现在他的研究过程和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尤其体现在他博大精深的区系学理论以及他创新性提出的被子植物“八纲系统”和“多期、多系、多域”起源理论。

第二件事是请吴先生修改我的另一篇比较解剖学论文。先生在几个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表示：我对你的上一篇文章提出了实质性修改意见，所以我同意作为合作作者，但对这一篇文章仅仅提出了几个小建议，不足以作为合作作者，建议我在作者中删去他的名字。在这次论文修改中，吴先生告诉我，他对我的苦苣苔科植物维管束解剖学很感兴趣，并透露了他的一个学习和研究经历。原来，吴先生在1930年代做张景钺研究生时，张先生给他选的题目就是植物维管束解剖学，研究材料也正是苦苣苔科植物，只是由于战乱没有进行下去。现在我所研究的正是吴先生50多年前要做的研究题目。吴先生对论文署名的明确态度尽管只是一件小事，却使我深刻思考了论文署名的真正含义。论文的作者应该首先是论文的贡献者，既然是贡献者，也就必然是论文的责任者，即为其贡献部分的责任人；最后才是论文成果的共享者。一个真正的学者更注重对论文的贡献和责任，而不是其他。这件事情不仅反映了先生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也体现了他先为人后治学和淡泊名利的做人风范与朴素的人生观。朴素的人生观折射出崇高的境界，也正如吴先生最喜欢的一句话，“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大凡一个真正的学者首先是做人的典范，一个受人爱戴的师者常是立德悟道的躬身先行者。“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这方面还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情。我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第一卷）“中国植物采集史（1949年以前）”后，对西方人从17~19世纪在我国的植物采集历史总结时写道：“西方学者对我国植物采集的献身精神当为国人之楷模”。吴先生在审阅时则批注道：西方人在我国的植物采集，尤其是一些公务官和传教士，多是受他们政府或团体的派遣对我国植物资源的掠夺，不宜如此宣传。2001年在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访问时，我看到本莫（Benmore）植物园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令我万分震惊的是，在这300多种杜鹃花中，竟然无一种是本土的，全部是在17~19世纪从中国西南掠夺去的。此时，我更感到先生的这一批注不仅反映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而且显示出他在中西方历史方面的深厚知识。然而，我尽管阅读了大量的植物采集历史文献，但对历史的纵深则知之甚少，甚至无知，甚感惭愧！

### 三、一些杂事琐记

1996年7月时逢吴先生八十寿辰，在昆明举行了“东亚植物区系特征及其演化国际学术会议”。许多国内外植物区系和系统学权威专家来昆参加该国际会议，同时向吴先生祝寿。生日那天，先生和夫人段金玉教授都格外繁忙。生日宴会后，由于段先生需要回去休息，会务组安排我这天晚上陪同吴先生。晚八点多，一切都打理好后，先生回里间休息，我则在外间守候。但这天吴先生很高兴，过了一会又来到外间和我聊天，并一直聊到了十点半多。先生详细讲述了他清华大学学生时期到西南联大的学习、科研和社会活动，又讲述了他50年代的一些社会活动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遭遇中所坚持的学术研究等等。从吴先生讲述的经历，我看到先生既坚持自己所感兴趣的科



学研究，同时又带着激昂的爱国情怀投身到救国救民社会活动中。然而，社会运动始终没有使他的科学研究中断过。从这些讲述中，我感受到先生对他的恩师吴韞珍、李继侗和张景钺的崇敬。另外，在西南联大期间吴先生和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爱国诗人闻一多交往频繁，从中看到他对闻一多先生的敬仰，以及闻一多对他在文学修养等方面的器重。从这些经历我悟出先生的学问渊博和理论的博大精深，除了他不懈的探索之外，也和他文理贯通与博采众长不无关系。先生在讲述他50年代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视察后，有可能让吴先生到国务院任职）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遇时，强调科研要有信念，还要修身养性，用通俗的话就是要能够坚持“坐冷板凳”等等。我十分荣幸地能够亲身聆听先生对自己人生经历的讲述，这些对我日后的学习与科研活动以及做人方面均产生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时间飞速而去，瞬间就到了博士后出站的时候。1997年10月，我做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吴先生在我出站报告的评语中写到：王印政博士对苦苣苔科的研究已臻成熟。这一简洁的评价既是先生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的鼓励。11月临行前，我到先生住处道别。当时，先生将他在香港回归之时的诗作七律“香港回归有感”赠送予我，并表示若我走得不这么急，他就会书写下来送与我。后来我回想起来，很是后悔，为什么没有将车票退了等先生几天？2006年7月，吴先生九十寿辰之际，我专门挑选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精美木刻作为生日礼物送与先生，先生很是高兴。2001年起，我精选了吴先生伏案工作的一张照片，装裱后一直摆放在我的办公室，时刻回想起吴先生的谆谆教诲。

先生一生耕耘，硕果累累，学冠古今，享誉中外。他那满腔的爱国情怀，他那对科学的执着探索，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他那渊博的学识和谦逊的品德，至今还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尽管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那音容笑貌、高尚情操和科学风范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先生的卓越人格令人景仰，先生的学术成就催人奋发。“为学无他，争千秋勿争一日”，这是先生的名言和一生事业的座右铭。将其作为追求事业的最高境界，上下求索，经久不懈，则是吾辈对先生培养之恩最好的报答，也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